

# 由实践哲学转向理论哲学的翻译研究

冯文坤, 万江松

(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成都 610054)

**摘要:** 翻译研究正在经历从实践哲学向理论哲学的转向。翻译的理论哲学思考集中于翻译本体论研究、主体论研究与存在论研究。其共性是, 认为对翻译理论的建构应着重于“翻译之翻译”的理性追问, 主张翻译研究应该从“现象翻译”中剥离出来, 以便能真正认识翻译的“真值”, 从而为翻译理论找到一个恒存的支点。这条路数既可能将翻译研究带上一条简约主义的道路, 亦可为自身跻身于人文主义关怀的学术领地开辟道路。

**关键词:** 理论哲学; 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走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7)02-0099-07

翻译研究长期围绕着“直译”、“意译”之争, 局限于“术”或“艺”、“科学”或“艺术”的手段与创造之争, 根柢于译者感悟与灵感、带有浓烈主观主义的“神似”、“化境”之争, 以及以“忠实”为标准的译文评判标准之争<sup>[1]</sup>。以此为基础的译学大都执著于翻译实际过程与译者具体翻译体验, 往往把实践中感悟而出的经验直接擢升至超验领域, 再返归之以引导具体实践。其论证方式往往是论者一隅之亲历亲为或译语片断的实证主义。在译学主张上, 要么把译者对原文“忠实”承诺的伦理观, 转换成为一种批判标准, 要么由针对翻译局部语境缺失或语境陌生化的句子所采取的补偿性策略出发, 得出翻译就是“创造”或“创造性叛逆”的主张。这些主张以特定对象的客观实在为前提与皈依, 其特点是相对性和有限性、外在性和描述性, 以此为基石之译学言论也就永远无法达到自我决定的、自足的、开放的、无限的可能性<sup>[2]432</sup>。就研究主体而言, 翻译家和译论家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自觉、经验、感悟、审美和认识混为一谈<sup>[3]148</sup>。其理论或其话语形态往往是“以此

为是”或“以此为然”的当下判断, 诚如《庄子·齐物论》所谓之“随其成心而师之, 谁独且无师乎”的“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sup>[4]50</sup>的私人独白。这是一种取之一隅的“实然”认识方式, 恰如庄子言:“是非之彰也, 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 爱之所以成。”<sup>[4]61</sup> 翻译理论要克服经验主义, 就必须超越“实然”, 擢升至“应然”的理论哲学高度, 把翻译作为“纯真”的理性来理解, 由翻译的实践哲学研究晋级到理论哲学的形上通化高度, 从而达到对翻译本真的把握, 使关于翻译的阐释功能向无限的可能性开放。

## 一 走向理论哲学的翻译研究

在哲学史上, 有两种最为基本的哲学理路: 一种为实践哲学理路, 另一种则为理论哲学理路。实践哲学认为理论思维为生活实践的一个构成部分, 理论思维不能从根本上超出生活, 不能在生活之外找到立足点, 认为理论理性从属于实践理性。理论哲学则认为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 可以超越于生活对象以及具体的实践活动。在理论哲学理路中, 理

收稿日期: 2006-11-18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翻译与翻译之存在》(项目批准号 06JA740012) 系列论文之一。

作者简介: 冯文坤(1964—), 男, 四川阆中人,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万江松(1979—), 男, 湖北随州人, 翻译学硕士研究生。

论哲学设定了理论理性的完全自主性、优先性与超越性,也设定了一个绝对确定的阿基米德点,并据此出发而构建起一个首尾一贯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是自足的和自我封闭的,它与个体人的感性世界和具体实践保持着距离,但因此却获得了足够的适应性与普遍性。理性哲学具有如下特质:重本质而反过程,重实体而反关系,重预定而反创造,重中心、同一而反个性、差异,重抽象而反具体。它在理性之根据上给出如下三种可能的回答:(一)源于世界自身,是所谓的世界理性、宇宙理性、上帝理性等等客观理性;(二)源于主体、自我、自我意识等等主观理性;(三)源于作为主客体之未分化或自我与世界未分化的人类存在或人类世界本身的人类理性、社会理性、交往理性<sup>[5]5</sup>。

理论哲学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就是要把对翻译的研究带出现实文本世界,逾越翻译实践的纬度,模糊翻译理论与现实文本之间的鸿沟。它把翻译具体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的排斥于视野之外,把追问“使一切翻译成为可能或不可能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作为己任,把探索那些逻辑地先在于一切翻译行为的同时又为任何一种翻译行为所分享的基本要素作为自己的目标。它感兴趣的是“规律”以及“理性”,它悬置的是立竿见影的“技术”与“手段”。其认识过程是从先验假设返回经验再认识,其论证方式是概念与范畴,并用它们去解释翻译本身如何是可能或不可能的。其动机与意图就是寻找涵摄于翻译中那个“逻格斯”或“翻译之道”。

就目前国内翻译界而言,翻译研究的理性哲学路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翻译的本体论研究。本体论(ontology)是表述哲学理论的术语。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在其著作中第一次使用了“本体论”一词,将其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sup>[6]3-4</sup>。本体论者主张脱离客观物质世界,从抽象概念出发谈论世界存在及其性质。《不列颠百科全书》(15版)把“本体论”界定为:“关于‘是’本身,即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关系性质的理论或研究”。翻译的本体论研究,就是要关注翻译之“是”,悬置翻译之“所是”,或从“是”推导出“所是”,或从“所是”上升至“是”。翻译研究中的“所是”是指个体译者的翻译行为,它们随译者的感觉在不同时空不同心境中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依赖感觉、经验的“所是”不具有实在性,不具有上升至超

验的高度而推而广之的条件。相反,“是”则是真正实在的东西,是变中不变的东西。本体性研究把译论的对象只视为“在界定对象时就认为界定是暂时性的方便之设,是为了认识对象而不是‘固定’或‘固化’对象”<sup>[7]54</sup>。为了避免翻译研究中的个体感性经验,避免“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的局部经验,本体论者就必须把现象翻译中的“所是”转变为“是”,使“是”成为统摄、包容一切“所是”的最高、最普遍的概念。

在国内外,围绕翻译的本体性研究出现了一系列具有范畴性质的概念,如海德格尔之“翻译”即“传统”,他将翻译定位为历史转化的内在传统,指出“翻译不仅是解释,而且也是传统。作为传统,它属于历史的最内部的运动”<sup>[7]67</sup>。斯坦纳指出,翻译就是变化,变化就是文化,因而也就是翻译本身,把变化/变异定为翻译的本质特征,也是人类文化的本质特征<sup>[8]164-173</sup>。以及德里达提出“延异”、“差异”等概念,并把这些概念的内涵作为事物存在的根据,“正是那种抗拒翻译的东西在召唤翻译。也就是说译者正是在他发现了某种限制的地方,在他发现了翻译之困难的地方,才会产生翻译的欲望”<sup>[9]24</sup>。本雅明提出“真理语言”、“纯粹语言”等概念,认为这样的“语言”包含在“翻译”之中,于是翻译就履行了传播“真理语言”与“纯粹语言”的功能。在国内学者中,郑海凌提出“实在翻译”概念作为翻译的理论哲学思路,并予以区别于“现象翻译”<sup>[10]</sup>。辜正坤提出“元翻译”、“玄翻译”等概念以便擢升翻译理论的形上高度<sup>[11]305</sup>。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蔡新乐在其新著《翻译的本体论研究》中直接把对翻译的本体性研究或形上反思作为自己的目的,并视之为翻译学的第三条道路而切入目前的翻译学界——“翻译学的第三条道路应是翻译的本体论,即对‘存在’中的人与翻译的关系问题的形而上理论反思以及人在‘翻译’之中存在表现等问题的理论探讨”<sup>[7]39</sup>,进而提出了“间性”、“元翻译”、“反翻译”、“非翻译”等概念,并最终把人归还为一种翻译的存在物。

(二)翻译的主体性研究。翻译的主体性研究是一种根柢于主体、自我、自我意识等主观理性的翻译研究。主体性的形成是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状态解体的必然结果,是人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对象化却又将自己淡出客观对象的自我觉醒。所谓主体性大致有这样一些含义:人是中心,人是万物之灵,一切

都是为人而存在的,人类的一切活动也都应当以人为中心而展开。把主体论引入翻译研究中来,并不是意味着翻译研究中一直有主体性阙如的问题,而是在主体性这一范畴内对翻译中译者地位与作用进行的反思性确认,是对传统译论掩盖译者主体性的一次去蔽,或者说是构成翻译活动中诸要素尤其是译者要素各自分享主体性的一次批判性再分配。

事实上,学界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作用的认识,既获益于主体性概念的引入,也得益于对主体性的理性认识。受到主体性重视主体、自我、自我意识等主观理性的启示,译者不再仅仅是原文—原作者的接受者与认识者,他还能够改造或创造他所面对的原语世界,把原语世界改造成更符合于他以及他所受限制的语言—文化—读者世界。对译者主体性的强调,就是对译者自我意识、自我心态、自我选择、选择的动机、自我历史—语言—文化语境、政治生态语境、读者接受视域的关注。

译界近年来由关注原文—作者“中心论”转向关注译者—译语读者的“译者中心论”,应该说,其内在的理论合法性就是主体性追问下的译者再认识,译者被视为工具、手段、奴仆等非能动性形象开始受到质疑甚至颠覆。依傍于西方经典哲学“符合论”的“忠实观”开始受到颠覆。“忠实观”开始由传统的标准观转化为一种译者对原文—作者的伦理承诺观。翻译研究的重心开始由“它是”向“我是”转向,开始重视译者之“此在”的境域构成,从而使译者被遮蔽的角色开始在主体理性之光中得以烛照。

当然,把主体性引入翻译研究,我们也要提防主体性误区,要明白主体性只是在认识领域中存在,用主体性理论来塑造译者主体性,只是在观念认识领域为译者彰目,它并不能在翻译的实践领域里改变译者与源语—原文本之间的互为彼此的“间”性互动。从认识论角度来讲,译者的主体性只是相对于他的认识的一种存在,那么,换一个认识就会有不同的主体观。不仅如此,译者在翻译行为上的主体性也是极其有限的,他只能在源语—原文本与译语—译语文化—译语读者等多元限度或关系内活动,他的主体性只能是有限的“自为”。对此,陈大亮指出:翻译主体性问题“不仅涉及到翻译主体的所指,而且涉及到人们对翻译主体性的认识以及相关的翻译主体间性的内涵等一系列问题”<sup>[12]</sup>。

(三)翻译的存在论研究。从哲学存在论角度

看,宇宙万物无不处于生长、变异或变化、迁移和转变的状态。变化是一切存在物的最根本特征。任何一个进入认识视域的事物,并不是它自身真实的面目,而是自身经历了生发、生化、生物、生成过程之后的现实结果。事物所呈现给我们的样子,实际上只是物自身主观过滤后的现象与表象。相对于事物在我们世界里展开的全部过程而言,物自身内部的事件显得非常遥远,甚至已经成为不可追忆的历史或神话而难以被人心所理解。

把存在论引入翻译研究,就是把更变、改易、化生、变异、变化、差异、陌生化等看成是源语—源文化—源文本的本质属性,看成原文内部生命力的活力,并构成源语文本可译性基础。存在论翻译观把“易”视为源语文本存在的最基本方式。《周易》之“易”有三义:变易、不易、简易。这不仅概括出宇宙运生转化的全部玄机,也概括出了翻译所蕴涵的精神。难怪唐代贾公彦、宋代赞宁要以“易”释“译”了。贾公彦《周礼义疏》即解释说,“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sup>[13]10</sup>宋僧赞宁在《译经篇·义净传》中写道:“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其所无也。”<sup>[13]13</sup>原文本的生命只能在另一种语言之内,才有真正的“易”、“他者”以及精神所需要的对“自我”的不断否定<sup>[7]252</sup>。源语—源语文本的每一次运动,总是出离于自身,是自身的不断涌现,是一次存在可能性的冒险。源语—源文本在“转换”、“摆渡”、“涌出”之途中要经历一个不断选择自身、生成自身并沉沦于自身的过程。面对无数的可能性,作为形式化了的新生命总是只选择一种它最本己、最有所倾向的可能性而生发自己、出离自己,把自己让渡给一个个新我。这样,就如蔡新乐所言:“翻译早已改写了‘原初’及(人对它的)经验。”<sup>[7]98</sup>原文在翻译之中运动,也就在翻译之中改变着自己。译文自身也就在新的起点上具有源始的创造性与新质。曼指出,翻译“颠覆了原文,使之破碎,使之游离于出轨,也使之被永久放逐”<sup>[14]24</sup>。故此,巴斯尼特正确地指出,“翻译作为破碎、游离和放逐的迹象,是20世纪末文化研究的新国际主义阶段的特征”<sup>[14]vii</sup>。

近年来,有意识地从存在论视野诠释翻译现象,已经成为翻译研究中的一个新亮点。德里达认为,“翻译是从同一性向他者的转换”,出离同一性,从而获得新值的“他者”<sup>[15]130</sup>。在他看来,“差异”、



“延宕”、“踪迹”、“差异”不断突破同一性的硬壳,而且为意义的流畅开辟渠道。他认为,翻译从出发点上就颠覆了忠实的可能性,因为文本“在显示自身之时就涂抹了自身,在发声之时就窒息了自身”。所“涂抹掉的”、“窒息掉的”,往往是那些“顽固的、未物化的、未溶解的、未扬弃的个别主体的踪迹”,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因此也是不可译的”<sup>[16]155</sup>。所保留下来的,恰恰是原文在译文中获得了他性而得以保留的,差异使同一的文化在他者文化中得以延续,同时也改变着他者文化的历史使命<sup>[17]5</sup>。本雅明指出:“如果翻译在本质上竭力求得与原作酷似,那么任何翻译均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原作的‘来世’中——如果它不是一种质变和一种活生生的东西的再生的话,就不能称之为‘来世’——原作已经经历了变化,甚至具有固定含意的词语也会经历一个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转世的过程中,“原作的生命在译本中得到最新的、最丰饶的繁荣,这种不断的更新使原作青春常在”<sup>[18]</sup>。可见,原文不被翻译,即原文的生命被阻隔或消失。原文的生命要延续,就得出离于自身。出离是生命的外化,原文的生命亦然。外化就必然带有异于先前的相异性。相异性是翻译最主要的特点,也是翻译的局限,但局限却构成了翻译的起点<sup>[19]120</sup>。翻译绝对不是对原文同一性的回归,“原作与译者在翻译中发生变化,而且翻译的结果——译作——也与原作共存。这时的原作与以前不同,它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因为翻译是不固定的,翻译永远在进行中,世界本身就是由翻译构成的”<sup>[19]120</sup>。翻译在进行中,人们也就永远置身于生生不息的翻译之中。

## 二 作为理性建构的翻译研究

就翻译研究的理性建构走向而言,基本可归纳为上述三个方面。主张理论哲学的翻译理论家们往往避开以“忠实”、“等值”、“原文意图”、“技术”或“艺术”等讨论翻译的传统观,而是要展示一道比“语言转换意义”上的翻译认知更宽泛得多的、更具思辨性的风景线。在这道风景线中,翻译不仅是精神产品的内在需要,而且更是人存在的样式(mode),如蔡新乐认为,翻译“适用于普遍存在的改变、更改、革新等文化状况或发展”<sup>[20]</sup>。辜正坤认为,翻译活动“是一种普遍活动,不仅人类具有,低等动物、植物也在进行某种形式的转换翻译活动。翻译是生命的存在形式之一”<sup>[11]305</sup>。在术语运用

上,批评甚至避开传统的翻译术语,或把它们当作伪范畴来诊治。他们心照不宣地认为:“为了批判一种术语,你必须与它保持足够的联系,为了避免回答用这种术语提出的问题,你又要与它保持足够的距离。”<sup>[21]</sup>要真正实现理论说服力的“无矛盾性”与“统摄力”,就“必须超出形式系统本身所提供的证明工具才是可能的”。因为对翻译过程的观察无论如何贴近实在,“往往是个别的经验,而且容易被某种理论观念感染”<sup>[10]</sup>。对翻译采取理论哲学的路数,就是要用理性的智慧之光,去克服现象观察所带来的局限性。对此,郑海凌把一种直接的源于翻译过程的接触叫做“现象翻译”,而把追问翻译的性质置于“实在翻译”的概念范畴之内,也即承载“翻译之道”的翻译之中,认为“翻译研究的学理应该建立在对纯粹理性的追求之中”<sup>[10]</sup>,也即对翻译之“非常道”之“道”的研究上。

对翻译研究采取形上方式,是出于对翻译学科不稳定的担忧,是为了将多元纷争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相互矛盾加以化解,而使翻译研究走上一条本质主义之路。但是这条思路却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挑战:由于本质主义关注的是始源、初始、元动力,寻找的是理性的绝对稳定性,一旦这种初始的东西与人发生关系,那么翻译也就在出发点上与人的主体性活动以及活动的多元化发生了关系。如,德里达把翻译视为“哲学的本源”,哪里有“一种语言以上”,那里就有解构,就有翻译,翻译就是问题本身<sup>[9]23</sup>。本雅明把“可译性”视为事物和理念的可演化性(可延异性)以及认为事物和理念本来就由他事物和他理念翻译而来<sup>[9]</sup>。这样,翻译也就与人类所有的精神活动以及存在发生着联系。其结果同样是导致翻译研究的泛化,这可能是某些建构翻译的“元”或“玄”研究的人所始料未及的。

## 三 转向理论哲学的翻译研究及其意义

第一,转向理论哲学的翻译研究,即从经验的描述层面转换向翻译之翻译,开始触碰支配翻译的理性逻各斯,触碰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及触碰翻译与人的存在之间(亦即翻译作为存在价值和作为揭示存在价值的翻译之间)、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词与物之间、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不确定性问题,表达与意义的分离等问题。这些问题或关系中,尤其是同一性与差异性的问题,不仅是事物存在的属性,更是人的共时性、历时性与未来性的必要构成条件,也

是任何精神产品在淡出自身,从而进入或迁移到“他者”,并在“他者”那里获得更生、自我保持的必要前提。长期以来,翻译研究中的“忠实观”、“等值观”以及局部的非此即彼的直译/意译之争,无意识地沿袭了一条奉“同一性”为绝对性的认识观以及由经验验证的实证主义观。一方面是在认识论层面上拒绝承认差异性,顽固地奉行忠实于原文、追求与原文等值的同一观;一方面又是在实践层面上原文不断被突破、不断被改写、被迁移的事实。前者贬低了翻译(作品),甚至从绝对的同时性认识论角度取消了翻译的合法性。后者目前则从接受者的视野那里取得了其合理性依据——即认为翻译永远隶属于“他者”,在时间、地域、意识形态等方面具体而又具目的性要求,它与人(译者)在社会中的生活、同人所处的社会制度及其运作密切相关。翻译不但是烛照原文的理性之光,也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建构自己作为认知主体的场所。当然,我们在此有必要说明,翻译研究中的理论哲学路数或转向,主要体现在对于翻译现象以及传统译论的反思上。这一认知转向最直接的意图,是对翻译研究中所盛行的“理性惰性”和斥翻译研究为“派生而非原生态”观点的质疑。我们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向翻译研究中的经验主义、描写主义学风发起一次突围。

第二,开启翻译研究理性之思,才能真正把翻译的本质存在与翻译(实践活动与翻译产品)的效果存在加以区分。翻译本质之确立,可以超越而非脱离翻译之具体实践,但却能为后者提供一种理论的阐释,如“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的关系,就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彼此依存的条件。可译性是文本存在的内在需要,是文本生命的由内至外、由隐至显、由沉默至言说的内在驱动力。它确保文本的延伸、重复与再生产。而不可译性是文本在流放、出离与外延途中源于对自我保护所产生的一种抗拒力。这种抗拒可以是文本外显过程中阻止翻译,不允许产生差异的一种障碍或困难。根本上讲,这种不可译性产生于维护“一体主义”与多元意义之间的张力中。按照存在论来讲,变异是事物的普遍特征,那么,“可译性”、“差异性”和“延异性”就构成了翻译的本质特征。“不可译性”则是原事物应该消失或死亡的东西。翻译是一种躬身而为的原初行为,但它却绝不是一种处于原点的状态<sup>[18][118]</sup>。由于一种语言异于另一种语言而存在,而作为个体

的人生来就没有选择余地地处在一种语言环境之中,那么翻译也由于这种“没有选择余地”而获得了它的必然性与普遍性。

第三,翻译研究的理性转向同时将自身变成了一个被诸多人文学科可以依靠的话题。把翻译视为一个“话题”,似乎比把它视为一个“学科”更为恰当。今天各路学者都似乎要对翻译发表一点议论,尤其是文化学者。翻译自身也似乎任意卷入其它学科,以致于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它消失在其他学科(主要是人文学科)之中。人们对它的审视角度,也都是来自“他山之石”的其它跨学科。翻译本质上内涵了不同的因素,例如语言、体裁、文化、译者主体性、时空地域变化性等等,正如“文本”这一概念可以包含所有的体裁一样。传统的语言学分析、比较语文学分析、文艺学分析乃至今天的文化学分析,既说明了翻译研究的多元态势,也说明了仅仅从一个角度不足以解释和检验翻译或译作。我们以为,翻译之所以成为人文学科广泛关注的对象,除了今天全球化语境中翻译之于人存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外,还在于其所昭示出的认识论路数:如翻译内涵的二歧性,文本的“重复性”、“再生性”、“被消费性”以及文本在流放中的“被他化”。这些又与人在劳动/实践中对象化、理念在表象中具体化、人在对象中客体化以及文本在阅读中“再生化”发生着深刻而本质的联系。这种研究路数总体上沿循了人文主义线路,并从这条线路中吸取理性资源。这条线路主要是以洪堡特、维特根斯坦、本雅明、海德格尔、德立达等人的学术思路为中心,重点突出翻译的本体性存在以及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因素和事物/人的翻译性存在。在文本阐释对象上,主要采纳文学、诗歌等文本资源,重视具有“可译性”(生命力)因素的文本。就此而言,翻译研究在学源上更加靠近翻译研究中的“文艺学派”或人本主义学派。

第四,理性哲学的翻译研究对语言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进入我们考察视野中的人永远是被说出来的,是一种被语言建构的存在。我们今天所赋予人的主体性只是语言为之建构、为之书写。被语言拒绝的人,只具有主体的潜在性。可以说,未被语词化的存在只能是一存在物,只具有构成主体的潜可能性。这一认识给予文本/理解的启示性意义,即进入对象视野或为对象所审视的事物必然是经过翻译了的。回到文本同一性,文本不可能成为文本,

文本必然在再生产与消费中占有和成为人的文本。由此可见,翻译中的主体性,不在于译者自身,而在于译者参与翻译之中,并与翻译之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是一种弱化的主体。译者是弱化的主体,就是指译者是翻译诸要素中的一维。一切文本实际上都是境遇性的,译者就是文本在这境遇中所必然遭遇到的一维。文本也在遭遇到译者的同时接受消费与更易的事实。据此,源于翻译的文本不是对于原本的忠实,而是原本的弱化。忠实原文,就是抗拒翻译。与自身保持同一性的原文,则是不与他人发生关系的文本,也就在出发点上取消了翻译。

第五,理性哲学的翻译研究关注翻译如何接近原文的问题。翻译过程的产品跟原文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考察文本的主体,即人。但是对翻译主体的考察,只能透过文本本身来进行。人为语言所占有,语言对自身的彰显,是通过对人的占有来进行。原文本的书写,不管它面对多么确定的读者群或以多么清醒的自我意识介入到他的书写之中,但他那部分被唤醒了出场,对于我们来说,是在语言中发生并通过语言彰显的。这对于译者来说,就意味着作为占有作者而出场的语言,必然会把作者置于它的背后或背景之中。与其说作者带着语言的面具,勿如说语言带着作者的面具。因此,我们所意欲获取的原初出场(作者)或文本主体则不过魑魅与碎片而已。据此,对如下内容进行探讨将变得十分重要:原文主体是自我同一的吗?对原文的忠诚是否是对一个确定主体的忠诚?忠诚似乎意味着对一个悠悠自在东西的绝对性保持认同。如果是,就意味着翻译是不可能的,我们对翻译的触碰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也就在原初的地方或出发点上取消了翻译的可能性。如果忠诚是不可能的,我们又将如何去认识译者的主体性或译文自身的存在合理性呢?如果翻译无法从出发点上取得其合法性,它之存在的必然性就只能在译者的境域中取得其合法性。那么,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又将在什么样的关系中得以阐释呢?翻译时,我们似乎直接面对文本,其实所面对的则是文本背后的主体,但透过文本的主体则不过魑魅与幻影而已,因此翻译所获得的不过是构成主体的碎片而已。翻译的主体(包括译者的主体)处在一种危机

中,一种批判性的状态中。翻译的主体与被翻译的主体会发觉自己成为被讨论、被批判的对象,彼此不得不进入“翻译”,或者说将自己变形,这种变形则成为消除对抗、解除危机的唯一出路。也正是这种危机会使我们面对一种全新的意义。

最后,理性哲学的翻译研究似乎会让我们明确无误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切现象翻译都是不完善的。其根据似乎是充分的。它根底于人类存在的有限性,而局限性的存在正是翻译存在与需要的条件。不仅翻译如此,这正是人类本身的状况,是人类存在的悖论。人有身体,但却不限于这个身体,然而没有身体人不能生存,也不能思考,这是一个悖论。翻译何尝不是如此呢?文本无法自身完成自己,必须接受触碰,接受翻译,但翻译却只能是对自己局部的翻译,这是翻译的悖论。文本也许会在自身中保持自己与自己的同一性,但这种同一性却是死寂般无音。同一性被触碰,被撕开一个口子,但却是文本新生的开始。这无疑是翻译的生命存在论基础。

#### 四 结语:永恒的翻译源于永恒的不可译性

翻译源于局限性,但却要担负其解决局限性的重任。有没有一种不依赖他者而自身完成自身的存在呢?没有。如果辩证法的二元关系不被理解为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彼此的互补关系,那么,在翻译这个具有舞台性质的空间中上演的就是一场多边互补关系的活动。构成这个活动之每一极只具有功能性而非绝对性。原文的绝对权威只具有虚假性。绝对权威要求的是忠诚与服从,而不是游离、出走、差异与变化。之于翻译,忠诚/忠实之要求,就是要对原文保持最大程度的沉默。但这不符合原文的存在论要求——忠于生命,保持生命,趋向生命的更生才是翻译存在的理由。翻译是一种活跃的实体,是人类活动、事物生长的内在驱动力。所有事物都是经过翻译的,普遍存在的“不可理解”可以证明这一点。一种未经翻译的状态(绝对存在、沉默,也包括纯粹的语言等),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一种纯粹的自然,一种仅仅属于生理区分的“性差”。就此而言,翻译拒绝“二项式”,但此处翻译却以非等级的“二项式”喻像地表达了一种存在论上的依赖性关系,如自然与文化、性与种、阴与阳、主与客、内与外。



## 参考文献:

- [1] 孙宁宁. 实践哲学转向对翻译研究的影响[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3).
- [2] 修毅, 徐晓风. 新世纪的哲学走向[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 [3] 方万全. 第一人称与翻译的不确定说[C]//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论文集. 香港: 中文大学哲学系, 1993.
- [4]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5] 王南鹓. 人类活动论导引[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
- [6] 俞宣孟. 现代西方的超越思考—海德格尔的哲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 [7] 俞宣孟. 本体论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8] 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9] 德里达. 书写与差异: 上[M]. 张宁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10] 郑海凌. 现象翻译与实在翻译——兼论翻译研究的若干新方向[J]. 中国翻译, 2006, (1).
- [11] 辜正坤. 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 [12] 陈大亮. 谁是翻译主体[J]. 中国翻译, 2004, (3).
- [13]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 [14] Edwin Gentzler. Forward. 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15] Jacques Derrida. "Difference." 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le, Ed.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86.
- [16] Eric L. Krakauer. *The Disposition of the Subject: Reading Adorno's Dialectic of Technolog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7] 翻译与后现代[M]. 陈永国编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18] (德) 瓦尔特·本雅明. 译者的任务[J]. 中国比较文学, 1999, (1).
- [19] (法) 拉达·伊凡科维奇. 永恒的翻译——置身于翻译[C]//辜正坤, 史忠义. 国际翻译学新探.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 [20] 蔡新乐. 翻译还是它本身吗? ——“通化翻译”辨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北京), 2001, (10).
- [21] 王玉北. 试论罗蒂的元哲学[J]. 江汉评论, 1995, (6).

## Translation Study: From Praxis Philosophy to Rational Philosophy

FENG Wen-kun, WAN Jiang-song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054,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 study undergoes a turning point from praxis philosophy to rational philosophy. A rational consideration of translation focuses on the ontological study, the subjective study, and the existential study, of translation. Its common tendency is to think that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should be aimed at the transcendental inquiries of “translation of translation”, stressing the split of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the phenomena translation so as to approach the “truth-value” and establish an everlasting fulcrum for translation study. This approach will possibly lead translation study onto a road of reductionalism and also clear up a road for translation study ascending into the academic realm of humanistic concern.

**Key words:** rational philosophy; translation study; tendency of translation study

[责任编辑:张思武]